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传承学术丛书

论道终南

终南文化书院 编

Lundao Zhongn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终南文化书院
中华文化传承学术丛书

论道终南

终南文化书院 编

Lundao Zhongn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道终南/终南文化书院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161 - 9730 - 1

I. ①论… II. ①终… III. ①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2226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曜

责任校对 孙洪波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2

字 数 243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论道终南编委会

主任 吴建新 漆思

委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常 新	陈志伟	段新龙	蒋冬双	刘 缙
马得林	孙江可	魏 萍	许勇强	郁志强
袁立国	张静斐	张丽珍	张鹏伟	张斯珉
张文娟	朱丹琼	朱锋刚	朱文慧	

主编 朱锋刚

编辑 郁志强

序 言

现代社会的人们在获取知识途径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多样化的
同时，驻足静心的闲暇却没有如期而至，反而显得有点奢侈。随着资本
对现代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个体不管喜欢与否都在见证着“钱”的
魔力，遭受其“效用至上”原则的驱使。曾在商业领域被广泛使用的
“时间就是金钱”的名句，开始在知识生产等精神领域生效。时间成
本与知识生产的效率问题就这么不期而遇。当人们在生产知识的过程
中过度关注生产效率时，“目的”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往往会被因与效率
原则相抵牾而备受质疑。然而目的往往需要置于“道”的高度予以审
视才能正确评价。给心灵留一点闲暇以供思考就显得非常必要。

面对面的交流早已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互通信息的唯一途径。
随着人类拓展生存空间能力的大大提升，即便交通工具的运输能力给
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身处不同地方的个体若想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克服空间所造成的隔阂。相较而言，移动通信、
互联网等传递信息、实现沟通的方式所花费的时间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既然面对面需要花大把时间才能将参与者聚在一起，因而除非
必要，否则这种交流方式会因效率问题而遭嫌弃。

生产知识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是效率吗？显然不是。安身立命，
或许更接近答案。“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
学人之间的交流切磋是避免固执己见、突破知识狭隘、寻求安身立命
的有益方式。因此，人们往往不顾所谓的“效率”问题，尽力克服困
难一起切磋学问。这有赖于信念与定力的支撑，才会有如此执着的行
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周易·系辞》）这份执着
正是基于对“道”的关切与觉解，正可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虽然整天在日新月异的器物世界中忙碌、牵挂、受制、享受，依然有那么一群人真切关注“道”的种子留存心田。甘雨降临，种子就会萌发生命力量。“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周易·文言》）地处终南山脚下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终南文化书院师生以此为宗旨，成立“论道终南读书会”，潜心于学，定期聚集讲学、相互切磋，共勉前行。参与者不言艰辛，只为在求学问道的路上思考、探索生命的意义与世界的精彩。

本书的篇目以时间为顺序，个别文章与主题演讲者当时的题目略有差别，这正好见证了“论道终南读书会”的成长与全体参与者的共同参与、用心付出的心路历程。由于本书缘起于“论道终南读书会”，故取名为“论道终南”。读书会的顺利开展得到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终南文化书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是为序。

朱锋刚

2015年12月于终南文化书院

目 录

“读图时代”意识形态的镜像

——从冷战思维到技术逻辑看意识形态的存在

 方式 常 新 (1)

“技进乎道”与“道通为一”

——关于中国传统技术思想的形而上考察 马得林 (15)

确定性的终结

——大数据时代的伦理世界 朱锋刚 李 莹 (27)

从社会问题到社会正义

——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袁立国 (37)

文化创伤与民族复兴的阴影 朱丹琼 (49)

元代水浒杂剧与《宣和遗事》关系新论 许勇强 李蕊芹 (62)

南宋讲武礼的动态考察 刘 缙 (72)

理论心理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取向研究 魏 萍 (83)

论数学的真理困境及其求解策略 蒋冬双 (102)

佛教的身体观探微 段新龙 (112)

积极情绪体验与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养成 张文娟 (125)

审美的文化“深描”

——新历史主义的美学特性 张静斐 (133)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意义研究述评 张斯珉 (151)

法律抑或信仰?

——纠纷情境中南宋民众的选择机制探讨 朱文慧 (178)

知道者悖论的推理错误与重构 孙江可 (196)

“撤点并校”政策的演变轨迹、双重逻辑及优化

机制 张丽珍 (208)

论儒家德性涵养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及其关系 张鹏伟 (222)

以道观之与物我齐一

——《庄子·齐物论》平释 陈志伟 (232)

“读图时代”意识形态的镜像

——从冷战思维到技术逻辑看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

常 新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图像在文化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它使整个社会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功能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层面，冷战以前“斗争性”的意识形态被“消费性”的意识形态掩盖，这似乎呼应了一些西方的思想家有意或无意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从政治学的角度可以发现，问题的实质并非如此，意识形态的斗争以新的形式在传媒领域展开。网络化时代通过网络建立了一个交流信息和观点的平台，图像中承载意识形态的内涵隐而不显，通过制造一种虚幻的假象，诱惑了人们的欲望，转换了意识形态存在的方式，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但其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并使意识形态的斗争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驾驭，它决定着未来意识形态的博弈结果。

关键词：“读图时代” 意识形态 隐蔽性

一 从政治意识形态到技术意识形态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技术化”，其社会根源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都完成了工业革命且向信息社会演变，其间所引起的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致使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所呈现出的尖锐的阶级性逐渐衰弱。物化和商业化了的社会重新调整了

作者简介：常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古代哲学史。

社会的人际关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机器功能相应地发生了转型，技术意识形态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方式。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揭示了这一演进轨迹。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首创，而是由法国启蒙理性哲学家特拉西于 1796 年首先提出来的，概念语意并不是从政治层面着眼，而是从认识论层面建立对概念和感知进行科学分析的方法的学问，“德·特拉西认为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只能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如果我们能系统地分析这些观念与感知，就能为一切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并得出更为实际的推理。特拉西对这一新兴的事业提出的名称是 Ideology——从字面上说就是‘观念学’。观念学是‘肯定的、有益的，可以具有严格精确性的’。在谱系上，它是‘第一科学’，因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包罗观念的结合”^①。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关于意识形态概念含义的表述，最重要的两种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对特拉西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对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的不彻底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特拉西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思想都是从观念，即意识形态本身出发去解释历史，而不是从历史及人们的实际生活去解释观念、意识形态。正是从这样的见解出发，马克思把颠倒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意识形态”与正确地反映着外部世界的“科学”尖锐地对立起来，阿尔都塞正是从这样的理论语境出发去思索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在《保卫马克思》（1965）等一系列著作中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纯粹的理论实践是不存在的，任何科学在其历史过程中不可能由于上帝的恩典而永远不受唯心主义的威胁和玷污，即不受包括它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威胁和玷污。我们还知道，纯科学只是在不断清除唯心主义的条件下才能存在，科学只是在不断摆脱那些窥伺、袭击和缠绕它的意识形态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在历史的必然中的自由科学。为了实现以上的条件，科学就必须同意识即唯心主

^① 汤姆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 页。

义进行不懈的斗争”^①。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不恰当地泛化了，且过分强调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无疑是对意识形态的简单理解，他通过对主体性真实性的否定，最终背离了他自己“保卫马克思”的初衷。

卢卡奇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现象”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物化意识”^②。在卢卡奇看来，“意识形态的东西乃是人类物质的自我再生产过程的一种产物，一种衍生物。认识这一点，乃是揭开意识形态之谜的关键步骤”^③。总体性批判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基础；对阶级意识和意识革命的强调是卢卡奇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同时，卢卡奇使意识形态问题从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转变为阶级主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塑造问题，赋予了这一问题更多的实践性。他以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为核心，并且结合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乃至日常文化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成为意识形态主要批判的内容，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倾向。

韦伯从社会行为层面理解理性，认为目的与价值是合乎理性的，他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时认为，西方文化特有一种理性主义特质，它使西方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东方缺乏这种理性主义。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韦伯的这一理论可以视为意识形态由强调“阶级性”转向“技术性”的一个过渡环节，法兰克福学派则主要从技术层面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展开批评。

法兰克福学派视虚假性为一切意识形态所固有的普遍特性，意识形态是其创造者为本阶级或阶层利益而杜撰出来的一种控制他人思想的力量，他们所倡导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如马尔库塞试探性地提出技术理性、统治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说：“把思想意识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特定意义上，

^①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3页。

^② 孙伯镁：《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③ 卢卡奇：《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

发达的工业文化较它的前身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之中。以某种富有争议的形式，该命题揭示了现行技术合理性的政治成分。”^① 到哈贝马斯那里，技术与科学就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则得到了更为明显的阐述：“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加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②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中，一旦技术与科学成了意识形态，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比较起来，它就具有更多的中立性和隐形性，从而也就更容易迷惑人。哈贝马斯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核心，是实践和技术差别的消失。”^③ 哈贝马斯认为，只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出现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技术的科学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瓦解了，出现了意识形态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科学技术才成为新的合法性基础和意识形态，由此缓解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控制、压抑了民众，巩固了社会统治。

二 图像中的意识形态

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人类通过和外部世界发生物质和信息的交流来创造自己的文化。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现代，其文化相应地呈现出后现代的特征，意识形态问题的范式也具有了后现代的特征，呈现出隐语性的特征，社会现实和

^①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③ 同上书，第71页。

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阶级性不再明显，而是潜在于文化的方方面面，这类文化不仅是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甚至在此之前首先是作为一种症候以及可能性的自我意识的一个符号。

意识形态的各种理论是对媒介分析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通过媒介中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可以揭示媒介如何协助观点和信仰的维系，进而维系一定社会秩序中的各阶级的利益和地位，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意味着在后现代社会中随着传统宗教信仰与习俗的削弱和社会生活的日益理性化，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再集中于有组织的政治集团所制定和信奉的世俗信仰体系，而是置于大众传媒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和社会领域中流通并与权利关系相交叉的诸多领域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形态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诸如德国、苏联、美国等国由独裁统治转变为“福利国家”，提出“现代国家”概念，认为“现代国家”最明显的发展趋势是“国家干预活动”的增强。“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马尔库塞），尤其是在新兴媒体领域，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说：“广播系统是一种私人的企业，但是它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权力……切斯特农场不过是国家的烟草供给地，而无线电广播则是国家的话筒。”^①毫无疑问，完全受国家权力控制的广播、电影等大众媒介所代表的是国家的力量和国家的权力，而众多媒体就形式而言，图像化是其总的特征。

对世界文化趋于视觉化、图像化，维特根斯坦说：“图像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不停地向我们重复它。”^②“在通行的将眼目作为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的文明中，当各类社会集体尝试着用文化感知和回忆进行自我认知的时刻，图像已经掌握了其间的决定性‘钥匙’。”^③这种新的视觉文化令人迷惑和焦虑。它把本身非视觉性的东西视像化，将文字的深刻含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页。

^② 米歇尔：《图像转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③ 肖伟胜：《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义具体化和直观化，给阅读者增添了新的意趣和视觉快感，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文化的图像化意味着技术化了的意识形态也发生着某种嬗变。

20世纪70年代，欧美的许多社会学家开始将从媒体那里收集和创作新闻及信息的过程重新概念化。他们认为，媒体在传送现实的过程中阐释现实。这里的核心思想是，新闻故事是以影响公众领会其内容的某些方式被构架（framed）出来的。构架是通过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而进行的，还借助那些用来表现被选择提供广泛传播的故事所使用的技巧，例如将信息融会贯通在叙事格式之中，或将特定的角度强加给观众，这些角度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例如争执、危险或冲突。^① 文化的图像化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要转换。利奥塔曾经强调“话语”和“形象”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他认为前者是理性主义的，依据的是“现实原则”，而后者是感性主义的，依据的是“快乐原则”。在读图时代，由于利奥塔所说的“现实原则”居于主导地位，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型。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表征的图像文化不再是一种生硬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大众通过一种为我所用的方式解读图像文化的文本创造自己所需的快感体验，从而逃脱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强行控制，但隐形的控制始终如影相随，并通过幻象的制造控制着人们。

“形象是某种或可获得或可利用的特殊权力的场所。”^② 不同于文字符号，图像是具一定实在存在的特征，世界被图像化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在图像的直观行为中，把图像本身等同于实物，这使图像有时会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处理过的图像“镶嵌”人们潜在的感官生活。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出了文化产业的经济力量越来越集中在一群人手中的现实，广告、宣传品和产品成为操纵人们的一种手段，二人相信，“当代美国社会中这种需求无论如何是一种幻觉，因为顾客已经被美国的社会制度塑造成只对同样的文化产业

^①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② 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业有同样的‘生产需求’”，“自由的民主仅是大众的一致”^①。约翰·哈特利在《理解新闻》中认为，电视新闻能够加强主导观念和信仰的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是它能让观众理解事件的意义，新闻播报总是试图把观众置于和新闻内容相关的立场上。视觉化的新闻播报运用旁白评论，使事件看上去似乎完全透明，自然而极具真实性，观众被这种有意识的“真实”的情境所蒙蔽，殊不知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毫无察觉地被观众所接受已成为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三 物化中的消费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现象时说：“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一切已经有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社会形式，都有这种颠倒。”^② 马克思对商品的这一论述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观念批判，而是对客观存在的被物化了的资本主义市场上人与人的关系的指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这种物与物的关系对人与人之关系实质的掩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从卢卡奇开始，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成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核心内容，正如卢卡奇所说，“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问题”^③。

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居伊·恩斯特·德波在其1967年出版的《景观社会》一书中谈到景观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景观是资产阶级经济关系拜物教的具象化实现。景观已经将隐含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变成了可见的虚假影像，这种虚假影像通

^① 约翰·多克尔：《后现代与大众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4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36页。

^③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过无处不在的对象性诱惑，引导人们进入欲望之域，进而形成了对人的无形控制。德波说，“景观是意识形态的顶点，因为它充分曝光和证明了全部意识形态体系的本质：真实生活的否定、奴役和贫乏”^①。德波这句话真实地揭示了生活在虚假影像下人们的真实的角色——仅仅是被操控的玩偶，操控玩偶的当然是具象化了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关系。

我们遵循德波的思路，可以把以图像为主的视觉文化的超真实性所形成的幻觉视为德波所说的一个景观，图像使得主体对观照的客体产生一种内容与形式完全统一的幻觉，这种幻觉在被动的人的眼前完全被视为真实的再现，镜头的一切是绝对的在场和绝对的真实，用鲍德里亚的话说就是，这种历史“不是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影像”^②。我们抛开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误读，仅从视觉技术层面而言，隐而不显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被图像巧妙地“消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这也意味着当代传统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已经悄然发生形式上的变化，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方式不再是社会的主流，但幻象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操控无处不在。尽管图像并非有意操控意识形态，但其最终的效果使得隐蔽的非阶级对立的意识形态范畴的再现成为可能并得到强化，这种强化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消费的幻象”来实现的。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引起了商品消费，其结果便是当代西方社会中闲暇及消费活动的显著增长，正如巴塔耶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引导普涨，使之成为一种全面的、无止境的经济增长。资本主义也生产出了各种消费的影像与场所，进而导致了纵欲的快感。这些影像与场所，还混淆着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狂欢要素转化或置换为媒体影像、设计、广告、摇滚录像、电影的过程。^③ 在文化经济中，流通过程并非货币的周转，而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消费者就

^① 居伊·恩斯特·德波：《景观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②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③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2页。

是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商品成了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① 鲍德里亚也谈道“我们今天生活在物的时代”，“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的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的一种根本性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② 费瑟斯通和鲍德里亚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现象的描述无疑是正确的，但鲍德里亚的“物的功能性拟像”所形成的“符码”说明，意识形态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交换赖以存在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是生成于符号政治经济学之中。“消费只身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③，这一观点其实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经济关系，物已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人通过物的操持所进行的一种表意。消费社会中人们通过使用物的消费，似乎在社会中找到了自己在社会特定秩序和结构中的位置。进而鲍德里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不再是资本增值，而是被激活了的无限的生产力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消费的逻辑成为消费社会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他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他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取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起整个社会的一体化，就像原始社会的等级或宗教礼仪所做到的那样”^④。鲍德里亚的理论虽然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但其对消费意识形态成为资产阶级非强制性同一手段所进行的批判极其深刻，显示了技术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合一性。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的逻辑起点之一，在《费尔巴哈》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道：“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

^① 约翰·菲斯克：《理解大众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②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③ 同上书，第90页。

^④ 同上书，代译序，第9页。